

書叢小題問會社

種六第

結癥的態病會社國中

著霖澤吳



版出局書會協年青

302

書叢小題問會社

結癥的態病會社國中

著霖澤吳

種六第

6

版
所
中 國 社 會 病 態 的 癥 結
權
有

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

著 者 吳 澤 霖

出 版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

發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
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

每冊實價大洋伍分 寄費另加

Social Problem Series

No. 6

A 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

by Charles Woo

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,
SHANGHAI

Price: Five Cents, Postage Extra, July, 1934

社會問題小叢書

在這變動的世界，每一人對於中國本身的問題和國際的問題，都當有一些基本的常識，以作應付目前嚴重形勢的準備。爲供給這樣的需要起見，我們特編輯小叢書二十餘種，其總題爲『中國與國際』，對於現今重要的各問題，皆作簡明的敘述。書目函索即寄。

中國社會病態的癥結

吳澤霖

一座戲院的著名與否，至少須有三個條件：（一）戲院的建築，尤其是戲台的構造；（二）演員的技術；（三）劇本的價值。三者之中，祇要有一種不合乎標準，則門票的銷售，就會立刻發生影響。一個國家，在世界上的地位，正和戲院一樣，也靠着三個條件：戲台就是它的自然環境；演員就是它的人口；劇本就是它的文化結構。際茲國際競爭十分尖銳的時候，任何條件，如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時，這個國家，就會發生危險。我們如根據這種標準來檢討中國，那立刻就可發現它國勢的嚴重性。

中國一向自命爲地大物博的國家，近年來地質學家，地理學家，經過了詳盡的勘

察和比較，發現中國地雖大而物却不博。自九一八以後，東北四省淪亡，西藏，新疆，蒙古等邊地，甚而華北各省，隨時都可變為他人的囊中物，所以事實上的中國，物既不博，地也不算大，在這樣的戲台上，即使我們有了優等的演員和有名的劇本，多少是一種限制。

中國全境在離海平線三千尺以上的區域，佔百分之六十五，真正適宜於耕種者，僅佔百分之三十五。雨量在耕種上，尤屬重要，在中國一年雨量在二十英寸以上的區域，僅佔全國之半，西北方面，旱災成為常態，而雨水的調和，反變為偶然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欲使中國變為穩定的大量農產國，實為自然所不許。其次，我們再來探討中國的鑛藏：在今日的文化下，一國的繁榮與鑛藏有直接的關係。工業的能否發展，幾全靠幾種

基本鐵產的貯蓄量和分配情狀而定，其中尤以煤鐵的出產量最爲重要。中國的煤素稱最爲豐富，但各專家的估計，亦大有逕庭，即使我們採取一種最低的估計，全國的貯蓄量，亦不下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噸，很可供好幾百年之用。惟這種大量的藏蓄，並不足使我們過於樂觀：因爲我們的煤田，大都集中於西北及西南角的山脈中，既與人口的中心距離得很遠，又沒有河道可以運輸到各方，所以即有大量的藏蓄，仍不足爲無上寶庫。

與煤礦同樣重要的，當推鐵礦，據最近的調查，全國所有的鐵礦，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噸，其中純鐵成分約有三六五〇〇〇〇噸。如以全國人口平均分配起來，每人尙分不到一噸。如照目前美國的每人消耗率來估計，那這些煤礦僅足供三

四年之用。自日本奪取東北以後，鐵產量更形缺乏，因為中國最重要的鐵產區域，向在東三省一帶。我們知道今日大多數的重工業和交通制度，都需要大量的鐵，鐵的產量既這樣缺少，確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大限制。

鐵以外的重要金屬，也並不豐富；金、銀、銅、鉛、錫等藏量，都極有限。中國的金礦，大部份都位於滿洲北境與外蒙古，每年這二處的總產量約有九二〇〇〇兩。東三省既為日本所攫取，產金量至少要減去半數。當然西藏方面，一向稱為產金區域，惟至今尚未有詳盡的勘察，即使該處確有金苗，遼遠的距離和該處複雜的政治情形，金礦開發的機會亦極有限。至於銀的產量，那是更為缺乏；因為中國的銀產，幾全為開發鉛礦的附帶產物，全年總產量，恐不會超過二〇〇〇〇兩。惟在銀的消耗方面，在世界各國中，中

國却列爲第二，每年缺少的數量，由此可知。銅鑛的開採，至今尙不算成功，出產量亦極屬有限。當然中國也有幾種鑛產，向稱豐富的，例如錫，鎢等的藏量，儘足供數百年的需用，但這些鑛類，究屬次要，在工業化的過程上，不能算爲基本的成分。

總之，過去的百餘年中，西方各強國的崛起，大都是由於開發和利用地下的寶庫所致。如以美國與中國來比，美國現在可利用的力，每人分配起來，要比中國大一百五十倍，每人的平均財富，至少要大我五百倍。當然，一國的強盛，由於許多因子的湊合，專靠自然物質的豐富，是無補於事的。但是反過來說，缺少了自然物產，即使其他的因子，都能齊備，終會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。中國的國勢日衰，原因固是非常複雜，我們在下面也要提及數種，惟自然物產的欠缺，確也是原因之一，尤其在工業文化的支配下，處

處需要力的供給，處處需要金屬的開發。在閉關時代，中國雖能自供自給。自捲入世界的經濟的漩渦以後，我國自然物產的藏量，就給我們很大的一種限制。就算將來能盡量開發富源，但要達到美國那樣的程度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。

中國繁榮的第二個限制，就要推到人口方面的各種問題。全國人口的總數，如根據最近內政部的調查，爲四七四，七八七，三六八人，全國面積如以四，二七八，〇〇〇方英里計算，每一方里亦不過一百十一人，這個數目，如與英，德，荷，意等國相比，似乎並不算高，惟全國面積在三千尺以下可供耕種者，僅佔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五，如以人口集中區的密度來計算，華北大平原的密度，每方英里爲六五〇人，長江流域爲八五〇人，山東江蘇安徽江西的盆地爲三五〇人，浙江福建及廣東海岸爲三五〇人，四川爲六

○○人。這五個區域，僅佔全國面積的百分之十七，但人口數，却佔總數中的百分之八十三，總平均起來，這五區內的人口密度爲五○○人左右。如再以耕地面積來做標準，則每方里爲一四〇五人，在長江以南各省則爲二一〇八人，在廣東則竟高至三〇一人。所以中國在世界上，無疑的爲人口密度最高的一國。人口衆庶，在疆域狹小窮兵黷武的國家，是立國最重要的條件，意大利和德意志在法西斯蒂專政之下，竭力提倡人口繁殖者，也就是爲了這一點。在工商業發達，和國際市場中享有地位的國家，製造品的輸出，儘足吸收他國的食料及其他各種原料，人口的繁密，亦不足顧慮。但在一個以農立國，同時農人平均耕地渺小的國家，那人口繁多，實爲一種大累。

中國所有的耕地，每人分配起來，究竟有多少？我們還沒有精確的統計。惟從各專

家的估計上，也可知道一些大概。據培克耳（Baker）氏的計算：河北省每人約可耕四畝，山東可耕三畝，江蘇二畝半，廣東一畝半。據服林（Voline）氏的估計，全國人口的半數，每人僅能有〇・三六畝——七畝。統計局最近的估計：浙江省每農戶約耕十三畝，江蘇十八畝，河北二十一畝。張心一氏根據金陵大學的統計：全國每人的耕地爲二・九八畝。如果每人每年需要的糧食，以三百五十斤計算，每畝的出產量在平常年平均爲二百斤，則每家農戶除了繳納各種稅賦外，也祇能自給而已。一遇災荒意外，因饑餓而死亡者，常以數百千萬計。在這種社會情形之下，多數的人，竭盡一生精力，但求一飽，猶恐不得，試問尙有何餘力，以求謀整個民族的改進。將來到了最嚴重的時期，人口的痛苦，更不知伊於胡底！

人口過剩的恐怖，在中國可說正在方興未艾的時候。人口的出生率，總在三十五左右，死亡率在平常時期，總在二十五六，所以中國人口仍在繼續不止的增加五萬萬的數目，在二三代以後，是極易達到的，可是耕種面積的擴大及農藝的改進，却未見得能够同比例同速度的進行。所以將來中國的人口密度，必較目前更為嚴重，每人平均所分攤的耕地，必更形窄小，到了那時，一般人的生活，必更乏出路了。

人口過剩的自然結果，就是民族的貧窮。本來貧與病是相聯的：貧窮的民族，往往也是病弱的民族。貧與愚也是相聯的：貧窮的民族，也常是愚鈍的民族。最後，貧窮與道德，也是相聯的：貧窮的民族，最能促進自私自利的心理。中國人的貧，已為世人所公認。據余天休先生的估計，如以每年每人的進款為二百五十元來做標準，則百分之九十

五的中國人，都爲貧民。著者以社會化的生活標準來推測，深信中國人中，有百分之九十八，都在過貧窮線以下的生活。在這樣窮困的情形之下，病弱當然是無可避免的。據醫學家的估計：中國患砂眼者，總有一萬萬人左右，患肺結核者，每千人中爲數之多，却爲世界冠。又據南京上海北平杭州蘇州青島威海衛等處學童體格檢驗的報告：患砂眼者，佔百分之四十八·三四；患牙病者，佔百分之三十九·八八；患扁桃腺腫大者，佔百分之二十五·二三；患淋巴腺腫大者，佔百分之二十二·一一。這樣的貧病，又加上了文盲充斥的愚以及自私自利，不肯合作的社會道德，試問如此的民族，如何能使其適應今日競爭劇烈的世界。要如我們再拿戲院來做比喻的話，中國的民族，宛如一班衣服襤褸，精神萎靡的演員，嘈雜擁擠於戲台上，請問如何能使營業蒸蒸日上？

中國繁榮的第三種限制，是社會結構的問題。中國的社會，向以家庭爲中心，爲基礎，盡忠的對象爲家庭；一生努力的目標，亦爲家庭，於是孝道就變爲至德，所謂『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孝之終也。』這樣的家族主義，從一方面看來，固然是社會秩序最有效的維護者；但從另一方面看來，却又是自私自利，不能合作，缺乏團體精神和民族意識的最要因素。在農業社會上，經濟活動的範圍，常祇限於家族或市鎮，所以家族中心的結構，儘可對付那種社會的情形，也可說是社會發展中一種必然的結果。但自社會逐漸複雜，團體逐漸擴大以後，於是經濟活動，就不再僅限於家族，團體間彼此關係的發展，使民族或國家成爲一般人休戚相關最深切的社羣，因此它們就進而成爲我人盡忠最高的對象。爲了它們的存亡或利益，有時竟需要個人及家庭的犧牲。

Robert K. Merton

在這種條件下，才能有大規模的合作，才能有熱烈的團體精神，才能有堅強的民族意識。中國的門戶已被迫開放，且已到了不得不和國家主義發達的國家相週旋的時候，爲了適應此種局面，在政治方面，教育方面，經濟組織方面，都非有徹底的改革不可，於是政體則由君主而民主而黨治；教育則由科舉而學校；經濟組織則由手工業而工廠，三者都由放任而漸趨統制。表面上似乎都在適應世界的潮流，但根本的社會結構，則一如其舊，並無何種徹底的改造。無論在政治，經濟，或教育上，家族主義，仍是十足的表現出來：老大一得意，老二老三豈怕不會顯達？面情重於才幹，家務重於公務，假公濟私和賄賂中飽，都已經根深蒂固，幾乎是積重難返。欲言改革，實非易事。惟這種根本結構，如不加以徹底的改造，那中國的一切社會組織，是不會走上軌道的。

中國一向不重法治而重人治，所謂『不一其能，不同其事，名止於實，義止於適，』這就是指無須設立一定的規矩準繩，而可使人必從的意思，因此就有『人在政舉，人亡政亡』的說法流行着。歷來所謂賢君者，大都是以法爲經，以情爲權者流；一國的治亂興衰，無不以得人與否而定，就是到了現在，仍是以人爲中心，法的權威，往往大受限制。這種富有彈性的政治體制，在比較簡單的農村經濟的國家中，彼此間的關係，向極單純，所有法令，尙少板刻化的時候，若使用這種制度，當然是十分適宜。但如社會已發展到很複雜的程度，或在疆域遼遠，政權散漫的地方，則人治體制，正足以滋長糾紛，破壞秩序，使政治不能上軌道，使法令無以能維持其尊嚴，結果，就是社會的不穩定。凡在不穩定的社會上，政治的混亂，固是意中事，其他經濟，教育等等活動，亦無時不受着極